

# 梁孝王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

尧荣芝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梁孝王文人集团的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地域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值得探究。梁孝王梁国为先秦魏国以大梁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区域广阔。因为地理上的便利而采取就近原则,是梁园文人聚集梁国的因素之一;而梁国深厚的地域文化积淀,也是文人们汇聚梁园的另一重要原因。再者,游士们因籍贯与游历等形成的地域分布特点,也促成了他们选择“从梁孝王游”。文人们依就近原则选择不同的诸侯国作为寻找仕进机会、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条件之一,这也正是促成汉初各藩国文人集团形成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梁孝王集团;成因;地理因素;就近原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6(2012)01-0107-04

汉文帝子、景帝弟刘武(前186?—前144)先封代王,两年后徙为淮阳王,八年后徙梁王。刘武去世后,谥曰孝,故称梁孝王。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辟,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sup>[1]2083</sup>《汉书·文三王传》也载:“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辟,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sup>[2]2208</sup>梁国出现人才彬彬之兴盛局面。梁王不仅具有大国诸侯与皇室嫡亲的恢弘气度,更是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仗义重情,对宾客如同知己。梁王还喜爱辞赋,善待辞赋之士,所以梁王门下的辞赋家尤其多,《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就有“梁客皆善属辞赋”<sup>[2]2365</sup>之说。这正与好儒学的河间王刘德形成对比,刘德门下的河间集团成员就以儒士为多。有人称河间集团为“经士集群”,那么梁孝王集团就是名副其实的文学集团了,仅从这里荟萃的辞赋名家如邹阳、枚乘、严忌、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便可确定。正如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sup>[3]562</sup>

梁孝王文学集团的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是主要的,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众,但对地域因素的考察却很少涉及,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其实梁孝王文学集团的形成,存在地域因素,是值得探究的。本文试从梁国地域范围和集团成员地域分布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 梁国地域范围、文化积淀对游梁的影响

梁王封地辽阔丰腴,《史记·梁孝王世家》是这样描述的:“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sup>[1]2082-2083</sup>《汉书·文三王传》也是这样记载的:“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sup>[2]2208</sup>

对于梁孝王之梁国疆域范围,周振鹤先生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也有详细考证:

《汉志》云:梁国,故秦碭郡,高帝五年为梁国。

秦于故魏地置有东、碭二郡,东郡置于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之后(《始皇本纪》),碭郡置于始皇二十年取大梁灭魏之后(睢水注)。魏大梁于《汉志》为浚仪,属陈留郡;睢阳《汉志》为梁都,定陶为济阴郡治;

收稿日期:2011-10-31

作者简介:尧荣芝(1965—),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

谷城在东平国北,属东郡,于是彭越之梁国大体方位已定。

……

《史记·文帝纪》:二年三月,“立子揖为梁王”。此时之梁国仅有碭郡。

《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二年,淮阳王武徙为梁王。”武之梁国比揖多淮阳郡北边三城。……“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引文皆见《汉书贾谊传》)。……二、三列城估计为襄邑、僂县、宁陵。此时之东郡当然仍属汉,否则孝王之梁当不止四十余城矣。<sup>[4]54-56</sup>

依从周振鹤先生的考证,梁孝王梁国主要为秦之碭郡和淮阳郡北边三城;而秦于故魏地置有东、碭二郡,东郡置于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之后,碭郡置于始皇二十年取大梁灭魏之后。

魏,本为西周封国,公元前661年为晋国所灭,封大夫毕万于此地。《史记·魏世家》载:“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sup>[1]1835</sup>魏城在今山西芮城县北。后来毕万势力越来越大,于是从其国名而称为魏氏。晋文公即位,令毕万子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公元前403年,魏与韩、赵三家瓜分晋国,正式成为一诸侯强国。魏国的疆域主要分为以安邑为中心的西部区域及以大梁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前一区域主要包括魏河西与河东地区,后一区域主要是魏河内及黄河南岸的中原地区。在这两大区域之间是韩国的疆土。

由此可知,梁孝王梁国应为魏国以大梁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即秦攻取大梁灭魏之后设置的碭郡,以及淮阳郡北边三城,有四十余城,大致是睢阳、虞县、下邑、碭县、芒县、襄邑、僂县、宁陵、浚仪、定陶、长垣、济阳、成阳、成安、鄆城、无盐、巨野、任城、单父、乘氏等。

再看其它几个诸侯王集团所在的区域位置。

河间集团的区域:景帝子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sup>[2]2410</sup>可知河间集团是研习儒家经典的学术性团体。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河间国隶属冀州刺史部,东、北、西三面为幽州刺史部,南面为信都郡,辖今河北衡水、枣强、武邑、冀县等县。

淮南集团的区域:淮南王刘安对艺文很有研究,善作辞赋,主持修撰《淮南子》。《汉书》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sup>[2]1747</sup>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高祖十一年,“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sup>[1]3075</sup>。裴骃《史记集解》:“徐广曰:‘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也。’”<sup>[1]3076</sup>《汉书·淮南王传》载,文帝十六年,“立厉

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sup>[2]2144</sup>。因此,淮南之九江郡为刘安之淮南国。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可知“淮南国东邻吴国,西界衡山国,北临梁国,南濒庐江国”<sup>[3]352</sup>。

吴国集团的区域:吴王刘濞虽不善文艺,但他“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sup>[2]2338</sup>。《汉书·高帝纪》载:“春正月,……以故东阳郡、鄆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sup>[2]60-61</sup>《史记·荆燕世家》载,高祖“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sup>[1]1994</sup>。由此可知刘濞吴国之封域与刘贾同,有三郡五十三城。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考证:“东阳郡为《汉书》临淮郡之淮东部分和广陵国全部”<sup>[4]36</sup>,”鄆郡为《汉书》丹阳郡原名,吴郡即《汉书》会稽郡前身”<sup>[3]34-36</sup>。那么刘濞吴国的疆域的确是很大的了,向北已到达淮水,在西北方向与和它几乎相当的梁国已经接壤,而南面则已至诸越(今福建),东面直达大海。

仔细分析梁国与吴国、淮南、河间等诸侯国区域范围之后,梁园文人聚集梁国的地域原因便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为地理上的便利而采取就近原则,是梁园文人聚集梁国的因素之一。吴国的西北接壤梁国,吴、梁是相距很近、交通便利的两个诸侯国。所以在吴王阴谋叛乱之时,严忌、邹阳、枚乘等文士在劝谏无果后便向西北而直奔梁国,从地理条件上来说是最实际的选择。河间国远在河北,虽然人们赞扬刘德“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sup>[2]2436</sup>,但要远走河间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古代交通很不便利的情况下,远近的选择也是要考虑的因素。那么淮南国也紧临吴国,为何不选择淮南呢?在相同地理条件下,当然就应该考虑其它方面的因素了,至少从地图上可看到,刘安的淮南国已是被一分为三的小国,远远不及吴、梁之广阔,汉人崇尚宏大的心理也会驱使这些文人选择梁国,更何况“三淮南之心思坟墓”<sup>[2]2338</sup>呢!

第二,梁国深厚的地域文化积淀,是梁园文人选择聚集梁国的又一因素。梁孝王梁国既为魏之故地,其地域环境显然有着深厚的晋文化积淀。晋文化有明显的反正统特色,主要表现为宗法制观念比较淡薄,也正因为宗法观念薄弱,使其具有尚贤、尚法、尚功等特点,三晋也因此成为法家文化的发祥地。同时,梁国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因为梁国都城睢阳及周围城池和淮阳北边三城襄邑、僂县、宁陵等都曾属楚国范围。楚文化具有开拓进取、开放融合、革新鼎故、至死不屈、亲鬼好巫、浪漫主义等精神特征。深受晋文化、楚文化影响的梁国,对梁园文人的创作有灵感的激发、艺术的熏染、知识的积累等作用。正如《汉书·地理志》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移民乎?’”<sup>[2]1648</sup>所以梁园文人才更愿意到梁国来。如枚乘《梁王兔园赋》对梁园景色和游园情境的描绘,温婉细

赋,韵味深长,并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sup>[5]23-24</sup>。

而河间国相对来说文化积淀不足,“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刺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击鼗,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sup>[1]1655-1666</sup>。这样的民俗让人望而生畏,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接近的。

## 二 梁孝王集团成员地域分布与游梁的关系

在梁孝王文人集团中,庄忌、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公孙诡、羊胜、公孙乘、路乔如等是主要参与者,我们不妨先看看他们的籍贯与经历,从中分析出他们归附梁王的地域因素。

梁孝王文人集团籍贯分布表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庄忌(前211?—?)	会稽吴(今江苏苏州)	公孙诡(?—前149)	齐(今山东东部)
邹阳(前210?—前129)	齐(今山东东部)	羊胜(?—前149)	齐(今山东东部)
枚乘(前209—前140)	淮阴(今江苏淮安)	公孙乘(不详)	不详
司马相如(前173—前117)	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	路乔如(不详)	不详

庄忌,会稽吴人,东汉避明帝讳,改称严忌,尊称“严夫子”。《汉书·艺文志》:“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旧注:“名忌,吴人。”<sup>[2]1747</sup>庄忌初仕吴王刘濞。《汉书·贾邹枚路传》:“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sup>[2]2338</sup>后因吴王有邪谋,对谋士的劝谏不听,“是时,景帝少帝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sup>[1]2343</sup>。庄忌的生年不详,“约与邹阳、枚乘相当略长,在公元前181年进入吴王府时,约三十一岁”<sup>[6]58</sup>。作为吴人,在吴王刘濞府任职,是一般情况下的首选。毕竟,既离开家乡又能在最大诸侯国施展抱负,这是人们很愿意做的事情。而吴王反叛,劝谏未果,不得已离开吴国时,庄忌已大约五十岁了。何去何从,有很多要思考的问题,但距离的远近对于年长的人来说是需要注重的。吴、梁接壤,交通便利,是庄忌选择梁国的原因之一。

邹阳,齐人,以文辩著名。《汉书·艺文志》:“邹阳七篇。”<sup>[2]1739</sup>邹阳生年不详,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云:“邹阳……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sup>[1]2469</sup>,称枚乘“枚生”,邹阳年龄应略长于枚乘,略低于庄忌,所以在公元前181年与庄忌、枚乘仕吴王濞时,邹阳约三十岁。

邹阳是齐人,选择到吴王府任职,也有地理上的便利原因,因为齐与吴国是相邻的两地。以现在地理位置看,山东与浙江之间隔了江苏,但西汉时的江苏大部分也是吴国封地,所以齐与吴实际是相连接的。当刘濞阴有邪谋,邹阳作书讽谏,吴王不听,于是与庄忌、枚乘等离开吴国去了梁国。当然对于年龄都在五十左右的这三人来说,选择距离较近、与吴接壤的梁国,是考虑赴梁的因素之一。

枚乘,字叔,淮阴人。《汉书·艺文志》:“枚乘赋九篇。”<sup>[2]1747</sup>《隋书·经籍志》:“梁又有……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一卷,亡。”<sup>[7]1056</sup>枚乘是公元前181年与庄忌、邹阳同时去吴国的,时约二十九岁,为吴王刘濞郎中。淮阴位于洪泽湖东畔,淮水岸边,是刘濞吴国的北面边境城市。所以,枚乘也是吴国人,在吴国做事也是未离开家乡的最好选择。吴王谋划叛逆时,枚乘曾上书谏阻,吴王不听,他便与庄忌、邹阳一起,离吴至梁,从孝王游。从地理条件说,这是三人依就近原则的选择。

吴王反叛时,枚乘又上书谏阻,吴王仍不听乘策,最终败亡。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声名大振。景帝任其为弘农都尉,他不乐做郡吏,以病辞官,复游梁国。梁国宾客都善为辞赋,枚乘尤其高妙。梁孝王死,他要回淮阴,枚皋母不愿跟随,枚乘大怒,弃母子俩而去。武帝刘彻为太子时素闻其名,即位后,以安车蒲轮相召。枚乘年事已高,途中死去<sup>[2]</sup>。由此可反证:一是枚乘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宁不做郡吏,也要去离家更近的梁国,宁放弃枚皋母子,也要回到家乡淮阴;二是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辗转颠簸,对于年长的人是很不安全的的事情,一般来说他们会极力避免去远离家乡的地方任职。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志》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sup>[2]1747</sup>。《汉书·司马相如传》:“以誉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薨,相如归……”<sup>[2]2529-2530</sup>此段文字的内容,《汉书》与《史记》几乎完全一致。这里把司马相如客游梁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是否就没有地域的因素呢?其实蜀郡虽远在偏僻的西南,但它与都城长安所在的司隶部却是南北方向的近邻,而司隶部与梁国又是东西方向的近邻。这样一来,一条近捷的路线便清晰可见。所以最初司马相如选择了去京城而不是其它诸侯国,从重要性上说是天子脚下,从地域上说是最近的去处。而后来相如从京城到梁国,也就自然是近距离的选择。

公孙诡,齐人。《汉志》不载其赋,《西京杂记》载其《文鹿赋》。《史记·梁孝王世家》:“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

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sup>[1]</sup><sup>2083</sup>《汉书·文三王传》的记载也是如此:“于是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sup>[2]</sup><sup>2208</sup>

羊胜,齐人。《汉志》不载其赋,《西京杂记》载其《屏风赋》。与公孙诡同时至梁,得到梁孝王宠信。后因“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sup>[1]</sup><sup>2085</sup>。事情暴露后与公孙诡一起自杀于梁王宫中。

羊胜、公孙诡虽然是因“奇邪计”得到梁孝王宠信,可谓“君臣相得”,但如果考察地域环境,也能发现其中的联系。羊胜、公孙诡是齐人,齐、梁是近邻,由齐入梁便利可行,所以他们选择游梁应该也有地理条件的考虑。

####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鲁迅全集(第十卷)[M].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6]石观海,杨亚蕾.梁园赋家行年新考[J].齐鲁学刊,2006,(2).
- [7]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公孙乘、路乔如,《史记》、《汉书》都未载其名,生卒行状不详。他们应该都是在景帝四年梁孝王大招游士的时候去的梁国,也是与羊胜、公孙诡同时至梁。由于没有这两人的生卒行状籍贯的资料,对其游梁的地理因素就不再考察分析。

总之,梁孝王文学集团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兴趣等因素外,游士们地域分布的特点,梁国的地域范围与文化积淀等,也是梁孝王文人集团的成因之一。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测出,吴国文人集团、淮南文人集团、河间文人集团等的形成,同样受地域因素的限制。文人们依就近原则选择不同的诸侯国作为寻找仕进机会、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条件之一,这也正是促成汉初各藩国文人集团形成的因素之一。

## The Regional Formative Causes of Prince Liang Xiao's Literati Group

YAO Rong-zh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main formative causes of prince Liang Xiao's literati group, the regional factors are worthy of study as well. Excep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personal interest, the territori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i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Liang State's territory are also significant. Literati chose nearby princes' feudal kingdoms to seek opportunities of be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alizing their life values. As a result, literati groups in feudal kingdoms emerged in early Han Dynasty.

**Key words:** Prince Liang Xiao's literati group; formative causes; regional factors; principle of proximity

[责任编辑:唐 普]